

Doi : doi.org/10.70693/jyxb.v1i1.29

“人民治黄”与革命时期中共的民众动员策略

赵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黄河泛滥数千年, 根治黄河为历代所企望, 而终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之手。中共总结其要诀为“人民治黄”。在革命时期, 为充分调动民众的治黄热情, 中共治黄机构从思想、组织、利益等多方面入手, 采取了非常多样与灵活的策略, 使民众治黄不仅自觉自愿, 且卓有成效, 这充分彰显了中共的人民本位理念。

关键词: 人民治黄; 民众动员; 人民本位

2019 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列为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治理与保护自此进入了新阶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地位凸显, 黄河的生态功能、水资源功能愈加重要。在黄河治理与保护的诸多方面, 如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性节水, 以及黄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 民众参与都能发挥重要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中国共产党接手黄河治理之初, 既有充分调动民众参与黄河治理的宝贵经验, 且成效斐然。深入发掘这些宝贵经验, 以有益于黄河治理与保护新阶段, 此时尤为必要。

在毫无准备与经验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开始治理黄河。1946 年, 国民党主张于抗战时期改道的新黄河重新由旧河道入海, 也即经由河南、山东入海。经过抗战阶段, 旧河道区域已多为解放区。国民党此举, 实有借黄河水分割解放区的意图。但新黄河漫溢形成“黄泛区”, 也的确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中共决定同意接纳黄河从旧河道入海, 也由此开始了黄河治理。1946 年, 中共先后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与山东省河务局, 分段治理中下游黄河。在治理之初, 中共几乎毫无经验可言。1947 年, 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对此评价道: “黄水即流入故道, 我们对黄河没有经验, 究竟水来后情况如何, 不大摸底”。¹于如履薄冰的治黄探索中, “人民治黄”模式逐渐成型。

民众动员, 直接关系到民众参与治黄的意愿, 因此也是“人民治黄”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在革命时期, 民众动员是中共的优势, 这种优势在黄河治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46 年, 美国记者罗辛格分别参观了国共的治黄工地, 国民政府所属民夫的无精打采与中共所属民夫的积极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将参观见闻发表在了 6 月 1 日的《大美晚报》上。²中共动员的良好效果, 自离不开中共治黄机构的重视与引导。1949 年, 冀鲁豫黄委会在治黄总结中说: “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就是人加工具和技术。科学的组织分工、足够的工具、熟练的技术, 才能发挥高度的劳动强力, 提高效率。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动员与组织, 其次是工具, 再次是技术”。³民众动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刚接手黄河治理的中共而言, 机械动力颇显匮乏, 几乎全靠人力。而最主要的, 就是依靠大量的民夫。这些民夫基本上是由沿黄河区域的民众抽调而成, 对他们而言, 参加治黄劳动只是一项支差任务。

¹ 王化云: 《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 年), 《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1-1947-0005Y, 第 4 页。

² 参见 L·罗辛格: 《治黄区域巡礼》, 原载《大美晚报》1946 年 6 月 1 日, 《群众》, 1946 年第 11 卷第 8 期。

³ 《治黄工作总结》(1948 年), 《1947、1948 年王化云主任代冀鲁豫区党委拟的关于治黄工作向中央局的报告和黄河工作总结》,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3-1947-0002Y, 第 8 页。

作者简介: 赵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激励，也即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动员，考验着中共治黄机构的智慧。

一、尽力解决治黄民夫的各类生活问题

治黄民夫的各类生活问题，包括家庭生产、饮食起居、身心感受等，中共治黄机构都一一发文，交代相关部门负责协调解决。1.民夫家庭内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农事繁忙季节，民夫往往无法兼顾治黄劳动与家庭生产。为此，治黄机构规定：“凡赴工民夫，其家中麦收锄苗，概由各该村组织代收代锄，使其安心做工”。⁴这样，民夫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黄劳动中。2.民夫治黄期间的健康问题。为保障治黄民夫的健康，在饮食起居上都做了要求：“在生活的改良上，吃饭、休息、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足够），各分、小队长掌握。如有病号及时医治”。⁵3.使民夫获得公平感。中共治黄机构认为，民夫的公平感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保证民工有饱满旺盛的情绪。为此，特别要求注意任务分配中的公平性，“一是村里派差与生产是否公平”“二是我们分工要公平”“三是强迫群众帮工问题。谁努力谁就得多做活，这就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⁶

二、对民夫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

民夫并无专业的治黄知识，这就需要治黄机构适时加以引导和教育。这些教育形式是多样而贴近实际的，如“利用每日上下工的时间进行集体教育，并发起自我检讨”“利用检工时进行个别教育，或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教育，当时指出优缺点，一致改正或发扬”。这些教育内容很少是理论性的，主要通过民夫的亲历实践进行教育，因此他们也更有体悟。如果说上述的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还属于批评教育，那么寓教于乐的形式则如春风化雨，为民夫所喜闻乐见，如“教育材料有治黄莲花乐，每小队一本。识字的单发一本，使其明了后扩大宣传，其他还有治黄宣传材料等”。⁷类似的教育形式还有教材、快报、地方戏等，在民夫休息时诵读或演出，既舒缓了疲累，又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三、借助组织力量，产生动员效力

1938年黄河改道夺淮河入海后，原有河道即成旧河道，荒废达八年之久。与此相应，国民政府的治黄机构也被废弃。黄河重归故道的主张被接纳后，中共只得另组新的治黄机构。与原有治黄机构相比，中共新组建的治黄机构已大有不同，它表现为典型的分权制特征：部门少、专业化程度低，因此有利于集中同一层级的决策权，也因各层级机构的权责统一而保证了其完成任务的动力。中共治黄机构成立后，开始积极建立党组织和工会。据1949年的《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称：“在各县工程队内普遍地建立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全河的河工会。现有会员八五五人。其他公船工人和造船工人的公会亦正在筹备建立中”。⁸党组织和工会的普遍建立，极大地提升了治黄成效。由于党员和大批的会员的积极带头，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四、发起各级劳动竞赛，并通过奖惩加以引导

⁴ 《关于国民党推翻菏泽协议后动员全民修堤浚河的布告》（1946年6月8日），《渤海行署、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加强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训令、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7Y，第4页。

⁵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28-29页。

⁶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23页。

⁷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19页。

⁸ 《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1949年7月18日），《山东局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9-0055Y，第34页。

在革命时期的治黄现场，劳动竞赛非常普遍，“发动区与区、组与组、村与村、个人与个人、挑夫与挑夫、砌工与砌工之间的竞赛，并自动订立竞赛的条件，由于号召了竞赛，鼓动情绪”。事实上，对于劳动竞赛的效果，中共是有预期的，“竞赛收获能把群众的情绪轰动起来，把工程修的快和好，并能创造出带头的劳动英雄模范”。既然是竞赛，就会有奖惩。治黄劳动竞赛的奖惩，主要体现在树立典型人物上。对于模范典型人物，“我们主动的采取接近和团结的方式，并尊敬和提高地位，开会时请他来参加或有事时和他讨论等，结果永久能起到带头作用”。⁹而对于非模范典型人物，一般要求其注意言论和行为。如有破坏行为者，则会发动群众进行批评教育或斗争。

有组织地逐级选举劳模，常作为劳动竞赛的后续措施配合使用。以1947年召开的安澜大会为例。为庆祝黄河顺利回归旧河道，中共冀鲁豫黄委会决定召开安澜大会，以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1.逐级召开安澜大会，选举治黄劳动模范。选举先从县里开始，“原则上各县在复堤、防汛、整险、抢险、献石、造船各种不同之英雄中选出四十五至五十人，参加县段安澜大会”；然后是更高一级的修防处，“每县段选出英模代表十人至十五人，参加修防处安澜大会”；最后是冀鲁豫黄委会，“各处由到会各种英模中，选十人至十五人到本会参加安澜大会”。2.各级安澜大会开始之前须先召开总结会议，“除汇报各段总结情况外，各部门尚可进行小会，研究总结工作”。3.在安澜大会期间布置陈列室，“藉以展览成绩，交流经验，互相学习”。4.设立英雄碑，将劳模“附以简略事迹，以便镌刻于英雄碑之上”。¹⁰通过设置上述议程，既启发和提高了群众来年复堤、防汛的情绪和信心，又交流了治黄经验，可谓一举两得。

五、发动基层群众，建立群众性治黄组织

这里以群众性防汛组织为例。黄河大堤蜿蜒千里，处处皆可能出险。根据黄河决口的历次经验，一般的是从堤上出漏子。防守疏忽，或者没有防守，造成了大祸。大水漫堤，以及从险工决口的情况，是很少的。因此，要想保证黄河不决口，必须依靠群众力量，“500多公里长的堤线和千百道坝埝，要做到不溃决，决不是依靠少数的人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不溃决才有保证”。¹¹国民政府原有的治黄机构远未做到这一点，“过去国民党防汛，是由汛兵负责。由于他们是官僚机关，不检查督促，虽有汛兵，不起作用。故而常常造成水害”。中共则利用自身的民众动员优势，逐渐建立起一套群众性的防汛组织和制度，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据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的总结报告称：“我们今年组织了群众性的防汛，这一套防汛的组织和办法，较为严密与周到，故濮阳县出了三次漏子，均能及时堵上，这一点濮县做的还很好”。¹²

中共所建立的群众性防汛组织，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明确了领导干部负责制。“在某一个县的河段，防汛工作做不起来，抢救不力，因而溃决，危及万千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就是一个县的党委和政府（包括修防段）的责任。不但在政治上负责，同时还要负法律上的责任。依此类推，我们这一级及地专级、区级也是如此”。因此，与防汛相关的各级负责干部更有动力做好民众动员工作。第二是治黄机构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群众性防汛组织的日常运转，主要依靠沿黄河区域民众的参与，这就需要所在地政府的协同配合。“具体的做法，应该由县政府协同段，统一布置到区，说明任务及办法，然后由区指定较强干部为副指挥长，协同段里派下去的干部，深入到村，动手去做”。¹³应该说，中共地方政府的紧密配合，使得中共的民众动员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⁹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9、27、28页。

¹⁰ 《关于召开复堤防汛等工作的总结暨立功表模大会的决定》（1947年9月17日），《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召开安澜大会的决定、通知及会议记录》，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6Y，第3页。

¹¹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¹²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32-33页。

¹³ 《对于今年防汛工作的初步意见》，《人民黄河》1949年创刊号，第40、39页。

六、结合群众利益，达成动员效果

在中共治黄早期，民夫劳动采用征工制，干多干少劳动报酬一样。这种工资制度具有支差性质，群众劳动不积极，效率较低。后来改为包工制，民夫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两种制度的优劣是比较明显的，“包工的办法，较征工为优。因为包工完全是群众自愿，而且与他们的利益相结合。故包工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就比征工好”。¹⁴ 碓工的态度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碓工是具有一定技术的工种。因为治黄早期实行无差别工资，“因此碓工情绪普遍低落，寿张反映：‘十里无歌声’，要求挖土不愿打碓。会技术的老碓工有的不上堤，有的上堤又走了，青年碓工也不再学技术，碓打的也不好”。后来提高了待遇，“按技术分为四等发给工资”。碓工的劳动态度随即发生转变，“老碓工上了堤，青年碓工请老师，夜里练习”。¹⁵

结合群众利益，逐渐成为中共治黄机构在定策时的重要考量。以护堤委员会的创设为例。黄河大堤需有专人看护，种植柳、苇也有助于保护大堤，中共治黄机构巧妙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1949年，冀鲁豫黄委会要求建立护堤委员会，“护堤委员会由村干及护堤积极分子组成，会下设护堤小组，分设植柳和护堤”。为了鼓励附近民众积极参与黄河护堤，黄委会将堤旁留地的收益交给护堤民众，“堤旁留地，可种植柳、苇，谁种归谁，树苗自筹，堤上的草归他收割”。与此相应，护堤民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种植及收割，要服从河防机关的指导。平水沟浪窝、看堤、看树、看草”。事实上，堤旁留地种植柳、苇，本身即可固土护堤，上述规定可收双效之功。此外，黄委会所种柳树，其部分收益也归护堤民众所有，“我们所植之柳，仍归公有，看柳人可按规定砍伐软柳枝”。¹⁶

“人民本位”理念是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要诀所在。1947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的战略进攻渐趋颓势，此时的蒋介石开始认真对待中共的优势。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说：“切不可再像过去一样，只重形式不问实际，只要农民、工人来入党，而不求切实的效果，这样一定不能发生作用。我们一定要学习共产党的长处，要有宗教家传道的精神，真正到农村里面去，真正为民众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福利，和他们达成一片，以取得他们的信仰”。¹⁷ 国共两党对民众的态度差异，在根本上取决于两党的理念差异。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人民本位”理念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中共须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革命时期的治黄现场，“人民本位”理念也充分展现了它的作用。1949年1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主任王化云在《三年来的治黄斗争》中总结道：“我们从治黄开始，就紧紧地依靠了群众，明确了人民治河的路线，因之广大群众在治黄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大批复堤、抢险、防汛的英雄，保证了任务的完成”。¹⁸

参考文献：

- [1]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4页。
- [2] L·罗辛格：《治黄区域巡礼》，原载《大美晚报》1946年6月1日，《群众》，1946年第11卷第8期。
- [3] 《治黄工作总结》（1948年），《1947、1948年王化云主任代冀鲁豫区党委拟的关于治黄工作向中央局的报告和黄河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3-1947-0002Y，第8页。
- [4] 《关于国民党推翻菏泽协议后动员全民修堤浚河的布告》（1946年6月8日），《渤海行署、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加强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训令、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7Y，第4页。

¹⁴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19页。

¹⁵ 《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二零年的任务》（1949年），《平原省河务局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五零年的任务》，1-GL1-1949-0124Y，第5-6页。

¹⁶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20、21页。

¹⁷ 《最近一年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报告》（1947年3月2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第53页。

¹⁸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 [5]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28-29页。
- [6]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23页。
- [7]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19页。
- [8] 《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1949年7月18日），《山东局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9-0055Y，第34页。
- [9]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9、27、28页。
- [10] 《关于召开复堤防汛等工作的总结暨立功表模大会的决定》（1947年9月17日），《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召开安澜大会的决定、通知及会议记录》，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6Y，第3页。
- [11]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 [12]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32-33页。
- [13] 《对于今年防汛工作的初步意见》，《人民黄河》1949年创刊号，第40、39页。
- [14]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19页。
- [15] 《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五零年的任务》（1949年），《平原省河务局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五零年的任务》，1-GL1-1949-0124Y，第5-6页。
- [16]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20、21页。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CPC's Mass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Guanghai Zhao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Zhejiang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s flooding plagued China for millennia, with successive dynasties aspiring to tame it - a feat ultimately achie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PC summarized its approach as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o fully mobiliz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ver management, the CPC's governance agencies implemented diverse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encompassing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material dimensions. These measures ensured voluntary yet highly effective public engagement in river governance,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CPC's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philosophy.

Keywords: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mass mobilization;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